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化育研究”丛书

刘 波 主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中国灵根

中华民族精神新论

袁久红 甘文华等 \ 著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 TIXI DE
ZHONGGUOLINGGEN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化育研究”丛书

刘 波 主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中国灵根

中华民族精神新论

袁久红 甘文华等 \ 著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 TIXI DE
ZHONGGUO LINGGE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灵根：中华民族精神
新论/袁久红等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8

ISBN 978-7-214-10368-0

I. ①社… II. ①袁… III. ①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1113 号

书 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灵根——中华民族精神新论

著 者 袁久红 甘文华等

责任编辑 张 凉 王 晗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0368-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 论 中国崛起、“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第一节 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 1

一、“中国精神”传统与“勤劳革命” 2

二、实用理性与“亚当·斯密在北京” 5

三、发挥“合法性”作用的中国革命传统 9

第二节 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 10

一、“中国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11

二、作为“中国精神”新生之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

三、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革命性重塑 17

第三节 “三个倡导”与“中国精神”的转化性再创造 21

一、“三个倡导”为“中国精神”当代再造定向 21

二、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扎根立新 24

三、“中国精神”的凝练升华及其实践构序 28

第一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生长凝结 34

第一节 一个伟大民族的诞生 34

一、“中华”与“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35

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轨迹 38

三、多元平等一体新格局 42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演化 44

一、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地理—历史条件 45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化 50

三、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人类精神的融摄互动 58

第三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意蕴展露 62

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积淀升华 62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意蕴结构 65

三、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追求 71

第二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哲理凝现 78

第一节 有机整体的世界图式 79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 79

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83

三、天人合一，一归何处 88

第二节 “致中和”的哲学 92

一、圆融应化 92

二、执两用中，与时偕行 94

三、和而不同 97

第三节 生命的安顿 99

一、尊生遂生、生生不息 100

二、“道法自然”与“平常心是道” 102

三、“知命”“厚德”与“自强” 105

第三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政治意蕴 111

第一节 殊异西方的政治思维 111

一、政治与人性 112

二、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之分 118

三、天下一国一家 124

第二节 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 129

一、崇尚“大一统”	129
二、“大同”与“小康”	134
三、和谐理念下的和平主义	139
第三节 亲民爱国的政治美德	143
一、“民为邦本”	144
二、“为政以德”	149
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54
第四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伦理向度	158
第一节 善的历程	158
一、人之初,性本善	159
二、“孝为先”与“和为贵”	161
三、上善若水与止于至善	167
第二节 仁礼合一	169
一、“天下归仁”	169
二、仁礼合一	173
三、礼法整合	178
第三节 利义之辩	180
一、重义轻利	180
二、义利并重论	184
三、义利与荣辱	188
第四节 智信勇之践行	190
一、智者不惑	190
二、无信不立	192
三、勇者不惧	194
第五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之维	198
第一节 美的观念	198
一、中和之美	199
二、游鱼之乐	202

三、空灵意境 207

第二节 美的呈现与中国艺术精神 211

一、中华“诗魂” 211

二、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 217

三、中国绘画与书法之美 221

第三节 美与生活 228

一、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 229

二、随性自然的生活观念 231

三、妙趣横生的生活情调 234

四、瞬间永恒的生活境界 236

第六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境遇 240

第一节 全球化与民族精神 240

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241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之悖谬 244

三、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极效应与现实挑战 248

第二节 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 257

一、民族主义话语的全球兴起 257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轨迹 261

三、民族主义价值的辩证考量 264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民族精神 271

一、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及其在中国的出场 271

二、后现代主义对民族精神的消解 275

三、后现代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拓展 280

第七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化育 284

第一节 中华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 284

一、“第二次革命”与民族精神的新突破 285

二、深化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新境界 289

三、推动科学发展与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291

第二节 “三个倡导”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深造 295

一、共富与利群精神 296

二、科学与理性精神 298

三、民主与法治精神 303

四、自由与平等精神 308

五、公平与正义精神 312

第三节 在中华“灵”“根”的培植化育中创造新文明 315

一、“中国精神”：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根” 316

二、“中国精神”创新化育需以坚定“三个自信”为灵魂 318

三、在民族主体性自觉中实践与化育“中国精神” 325

附录 大学开展民族精神教育的国际镜鉴 336

一、美国大学与“美国精神”的型塑 336

二、英国大学之民族精神的培育模式 342

三、法国大学开展民族精神教育的经验 344

四、日本大学民族精神的培育体系 346

五、韩国大学民族精神化育的显著特色 349

后记 354

导论 中国崛起、“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伴随着 30 年来中国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精神”广为人们热议。“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正在重新被批判反思。突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在中国崛起中的价值及所起的作用，正被许多有识之士津津乐道。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身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取决于在“归根还本”中“中国精神”的新生，亦即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在当代的转化性创造。而这种转化性创造的坐标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要以“三个倡导”为标帜，积极培育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节 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迅速崛起。

中国的崛起着实令人震撼，让人迷惑，甚至在许多西方“中国通”眼中都似乎显得有点“突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早在 1989 年就说，中国近年来的现代化努力，其规模之大超乎想象，他追问道：“中国能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 19 世纪典型的铁

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①

事实是中国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中国的成功崛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宏论颇多（如哈维、斯蒂格利茨、雷默等），而从历史传统与精神文化根源上深入探讨的则显得很不够。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伴随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凤凰涅槃”，其中“中国精神”传统、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交锋较量、激荡冲突、对话融合一直持存着，直至现在。三者在中国的崛起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推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深刻转变，催生着一种新的“中国精神”或者说一种新的文明的生成。

一、“中国精神”传统与“勤劳革命”

“中国精神”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中沉淀、内化，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的崛起，乃中国人的共同奋斗之果，因而必然蕴含着华夏传统延绵不绝的深厚历史记忆，具有中国人共有的精神特质，内含着“中国精神”的特有的力量。中国的崛起和成就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甚至有些历史和传统本身就是当代发展的直接动力。如同英国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传统特性有很多今天仍旧非常明显地存在于现实中，清晰可见。这个国家依

^①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旧有广袤的领土,与18世纪晚期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几乎相差无几。政府保持着社会枢纽的地位,与帝国时期一样不可侵犯。作为思想巨匠,孔子的学说正经历大规模复兴。尽管儒家时期和共产党时期有着巨大差异,二者还是存在重要的共同点。这么说不是否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要强调中国的特色还包括极具生命力的连续性——作一个科学上的类比,它的DNA仍旧完整如初。而且,这个国家对历史的依赖比任何其他国家更甚。过去由于未能实现现代化和统一,它饱受磨难,这段历史仍然如阴云一般笼罩着今天的中国,让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遗憾和痛苦。但随着中国最终超越‘屈辱的世纪’、成功完成经历150年的现代化大工程,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会沉迷于本国的历史,感慨公平终归来、世界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和状态。”^①“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概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这个“精神自我”历久弥新,呼唤着激励着人们去创造与生产、去奋斗与牺牲。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一般被概括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谁能否认这六种基本德性在中国崛起中的伟大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作用呢?当然,尚需要对这六种德性与中国崛起的勾连作深入分析,以免空疏。在这里,我们仅以“勤劳”这一基本德性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作一分析。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坚忍勤劳的民族。勤劳就是不辞辛苦、坚持不懈的勤奋劳作、苦干实干,反映的是一种崇尚通过本本分分的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观。纵观世界各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恐无超乎其上者!这实在是代表着我们的“民

①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79页。

族之魂”。

鲁迅有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他对“民魂”有透彻把握，既批判其劣根性，又彰显其夺目优长。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直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传统的“勤劳”美德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最显见于3亿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打工”，正是靠着他们坚忍不拔的辛勤劳动，推动着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巨型社会变迁——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史无前例的滚滚向前发展，这些“农民工”，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脊梁吗？日本学者杉原薰就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新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也指出，“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②

“勤劳”甚至可以说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基石。杉原薰在其著作《东亚经济发展道路：从长期的观点看》中正是用“勤劳革命”理论解释了东亚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中国崛起的根源。在杉原薰看来，世界历史道路从16世纪开始大分岔，其中一条是由英国开辟、美国发展到极致的“西方道路”，一条则是始于主要由中国开辟的“东亚道路”。其中，“西方道路”由“工业革命”开辟，“东亚道路”由“勤劳革命”开辟。他指出，在16—18世纪，东亚世界首先由中国发展出一种劳动力吸纳型制度框架，努力通过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以求改善经济，从而促成了前所未有的、举世无双的“勤劳革命”。这一“革命”带来18世纪的“中国奇迹”（1800年中国人口上升至4亿人，不但生活水平没有恶化，而且通过有效

① 鲁迅：《鲁迅杂文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30页。

②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的劳动吸纳体制使生活得到改善)。杉原薰认为,“开辟了西方道路的工业革命是一个‘生产奇迹’,它大大提高了世界一小部分人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开辟了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是一个‘分配奇迹’,它通过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①杉原薰用“勤劳革命”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处于开始于明清之际的“勤劳革命”并由中国革命重新奠基的历史延长线上,它扎根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勤劳致富的传统及经过中国革命转化的集体主义,且即使在高度市场经济环境之下,都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在今天及未来,只有“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是相反,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②

二、实用理性与“亚当·斯密在北京”

“勤劳革命”使“中国奇迹”再度出现,但如许多人都指出的那样,中国崛起的主要根源还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市场经济”是西方的发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可以划等号的。甚至就连哈维这样鼎鼎大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中国的崛起归因于“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与利用了市场经济,但并未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究其文化根源有二:一方面是根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实用理性”精神。“‘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③这种“实用理性”的特点是,“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为此,“不仅善于接收、吸取外来事物,而且同时也乐于和易于改换、变易、同化它们”。“这

①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②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③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页。

个实用理性的系统论模式是中华民族将外来事物中国化而后使自己延续生存的基本文化方式”，“它是一种民族性的现象”^①。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从文化根底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归结为中国精神传统中的这种海纳百川、经世致用的“基本文化方式”。

另一方面，走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以富民强国，这在中国亦非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如同科斯、阿里吉强调的，中国的崛起走的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正是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在“塑造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②。

科斯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一片商业和私营创业的沃土”^③，其“富民”思想传统也源远流长。当问及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有如下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④创立道家的老子曾说过“我（指君王）无事为而民富”；司马迁也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战斗口号的邓小平那句朴实的话——“致富光荣”可谓是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遥相呼应。科斯因此认为，“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并且他断言，“中式市场经济将以一种当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阔步向前，而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将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⑤

而在阿里吉看来，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基于传统而创造的，是向着中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24页。

②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③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④ 《论语·子路篇》。

⑤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国古已有之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的“回归”！向市场经济传统回归，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可阿里吉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发现。中国自宋朝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就存在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关于这一点，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有认定。阿里吉说，“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个国家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在扩建中，但其在18世纪的成形源于明朝和清朝早期的建国活动。”^①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市场意识发达，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深深误读了斯密，把其市场经济当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斯密当时看好的是中国式的市场发展，他没有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且极力主张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在斯密看来，18世纪的中国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的典型范例，是走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因此，黄宗智、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发现了，欧洲虽信奉自由市场，但真正来说，“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未受斯密主义影响，却以其“实践相关性”体现着斯密的市场经济原旨。而今日中国之崛起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上，这并非总设计师邓小平受到了斯密的启发，他所做的只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由“勤劳革命”开辟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传统。

与这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呼应，明清时期许多政治经济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威廉教授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2001年）中就以清

①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朝政治精英陈宏谋(清朝名臣,官居东阁大学士)为例,阐明了18世纪中国政治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推崇以市场手段发展经济。罗威廉提出,虽然18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没有将利己的经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总结为理论,“但陈宏谋将市场赞誉为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丝毫不亚于斯密、霍布斯、洛克或孟德斯鸠”,“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陈宏谋毫不犹豫地促使地方民众参与到其各类发展计划中,如建设新道路、为地区出口引进新商品以及建社区粮仓等。在一种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相去不远的模式中,陈宏谋认为这些计划给所有人带来利润……其程度与其带给每个人的利润恰恰一致。”^①

科斯和阿里吉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崛起的“另类”历史传统根源,也昭示我们:中国精神传统不应该被简单认为是孔孟之道的死板教条,它是活生生的,存在于诸如陈宏谋等一大批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精英之创造最发达市场以改善民生的实践中;中国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商业文化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传统的伟大复兴。科斯还饶有兴趣地谈到建国初期毛泽东问策“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梁漱溟提出“建设新中国”应该和“了解旧中国”齐头并进,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科斯说,毛泽东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一条通往繁荣富强的可靠的道路,中国过去的任何历史都是阻止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绊脚石,然而,“现在的中国终于可以理解梁漱溟的教诲了”,三十年市场化转型表明,中国在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同时回归自己的传统”。^② 科斯也预言:“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未来的未来给世界

①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②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带来更大的惊奇。”^①

三、发挥“合法性”作用的中国革命传统

“中国精神”传统也不应该被认为就是古典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精神传统,它还包括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传统,更包括现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传统。阿里吉分析中国崛起根源时的十分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深挖了明清时期“勤劳革命”与市场经济实践传统,更是深刻指出了,中国的崛起的巨大精神资源就是“中国革命”传统,这个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为核心的“革命”传统本身就是对已有“中国精神”传统的革命性重塑,它是中国在当代崛起的引领性动力。

阿里吉十分赞同汪晖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源或者说中国重新崛起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彻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却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未批判毛泽东的整体思想。”这如汪晖所言产生了两种效果:

——“第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的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第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因此,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遗产的复兴也为未来政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②

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传统或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发挥着政治学意义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治

①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3 页。

② [意]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1 页。